

再论中国体验:内涵、特征与研究意义

周晓虹

内容提要:“中国体验”指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所经历的同样迅疾的精神嬗变。同宏观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带有鲜明的二元特征一样,在现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迁即所谓“中国体验”也一样带有鲜明的边际性。这种边际性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中国体验”是急速的社会变迁的精神感悟,是前后相继的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及其“翻转”带给人们的精神烙印,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变迁的一种独特视角,为我们构建中国品质的社会科学提供了现实的契机。以中国体验为研究议题,既为我们将中国社会这场旷世未有的大变迁转化为社会科学的学术资源提供了可能,也有助于我们最终揭示人类社会心理变迁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中国体验;内涵;基本特征;研究意义

如同人们现在常常谈及的中国经验一样,我们这里所谈论的“中国体验”即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最近30年中所经历的微观嬗变,也是转型社会学所必须关照的主题之一,或者干脆说是一种转型社会心理学,再或是方文所说的“转型心理学”^①。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之大和影响之深,不仅表现在它浓缩了人类社会变迁的诸多历史进程,带有文明转折的意蕴;而且在于,生活在转型时期的这一代或数代中国人,在自己短短的生命周期中几乎以一种精神“填鸭”的方式,经历了和浓缩了几个世纪的嬗变,这种嬗变对这十三亿人的精神或心理重塑称得上是旷古未有。^②这一切决定了观照“中国体验”成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③

一、中国体验:现实抑或虚幻?

“中国体验”涉及1978年后开始的迅即和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以及在转型背景下作为一个现实整体的中国人的精神嬗变。如此,与此相关的重大问题首先自然会是:我们所谈论的这种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是真实的吗?也就是说,中国体验作为一种整体的精神感受是否具有现实性?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说,如果单就个人生活而言,伴随其生活环境或个人境遇的变化,其人格和社会行为模式自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这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但是,

注:本文根据作者2012年12月8日在纪念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建系30周年庆典上的主题讲演修改而成。

作者简介:周晓虹,法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理论。

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国民呢?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整体,比如整整十三亿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他们的总体精神世界同样也像个体的精神世界那样会发生某种基本一致的变化吗?

理解“中国体验”的现实性,首先涉及到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诸如阶级、民族、国民这样的人群共同体存在某种集体的或共同的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众所周知,来源于不同学科的社会心理学家分属社会唯名论者和社会唯实论者两个主要阵营:前者认为只有个体是现实的,而社会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物,是标示这个虚幻存在物的一个名称,因此,所谓群体心理如弗洛德·奥尔波特(Floyd Allport)所言,不过是人们通过想象建构起来的一种“群体谬误”;^④后者则认为社会固然是由个体组成的,但一旦个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就有了独立存在的特性,或者说成了一个实体的存在,具备了组成它的单个人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⑤正因此,持社会唯实论观点的社会心理学家如安德烈耶娃(Г. Андреева)所说,认为“除个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表征团体心理性质的某种东西,并且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东西来决定的”。^⑥不过,“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说法不同:比如,黑格尔使用过“民族精神”,迪尔凯姆使用过“集体表象”,韦伯使用过“资本主义精神”,恩格斯也同样论述过那种“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⑦另外,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论述过环境、法律制度(联邦制度、乡镇制度和司法制度)和习俗,塑造了美国人独特的国民性格,使得他们“往往不会为政治激情所振奋,他们的胸膛中激荡的是商业激情”。^⑧显然,这里所指的美国人,不是单个人的个人,而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成员。

作为社会唯实论者,我们显然承认包括阶级、民族和国民心理在内的群体心理存在及嬗变的现实性,也承认正是这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与此相应,十三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才会在整体上发生同样迅疾的历史性嬗变,形成所谓“中国体验”。中国体验的这种现实性,起码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1)中国体验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国民性”,或者说是一种转变中的国民性格的组成成分,是十三亿中国人在改革开放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基本社会心态、精神感受与情绪氛围,是一种与时代密切相连的时代精神。(2)中国体验的现实性,首先取决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现实性,我们已经看到,这三十年的社会大转型不仅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使得中国一跃成为GDP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组织方式、社区和社区管理方式、人们的就业方式,一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种现实生活的背景,这一系列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化,不能不影响到生存其间的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心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体验的现实性,是由中国经验的现实性决定的。(3)同英克尔斯等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的一样,我们一方面承认中国体验是中国国民的一种整体社会心理,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由于阶级阶层地位不同、生活的城乡环境不同、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同、从事的职业类型不同,中国体验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精神状态——用英克尔斯的话来说,不是一种“单峰”众数人格^⑨——它本身也是多元的、复杂的。所以,在我们讨论中国体验的积极进取的一面时,方文也会看到中国体验的忧伤纬度^⑩,马广海则会论述贫富差异也是一种中国体验。^⑪

我们所以非常强调这30多年来的社会变迁对中国人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因为古往今来还没有任何一场变迁会给中国人留下如此巨大的精神冲击。远的不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有两次,一次是因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而起的朝向现代的转型,另一次是1949年的共产主义胜利而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巨变。这两次大变迁确实都给传统中国带来过变革的希望和变革的现实:1911年,皇权被推翻,包括马克思

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的东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都使传统的中国人在价值观和社会行为诸方面发生了朝向现代的演进;1949年,蒋家王朝旧政权的被推翻,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对社会的经济控制权、政治支配权和行政干预权,重建了中国城乡的新秩序,也确实给大多数中国人带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希望和兴奋。令人遗憾的是,前一次大变迁因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很快将几亿人民带入更加巨大的苦痛之中;而后一次大变迁,却因为高度整合的刚性社会体制和领袖人物的个人专断,在短暂的成功、兴奋和激动之后,走向社会的大动荡和大灾难。严格说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始终没有走出传统的束缚和制度性的压抑。

1978年后发生的大变迁和社会转型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场大变迁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在广度上,它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始,推向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党的十八大后还欲向被称之为“改革攻坚战”的政治领域尝试性推进;在深度上,它所触及的层面非常深刻,有相当一部分触及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和我们这个社会体制的深层结构,由此带来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大动荡、大起伏;在时间的持续性上,如果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持续了十余年就寿终正寝,1949年的革命到1958年的“大跃进”实际上就进入了“危途”,那么,这次的大转型历经三十余年仍然未见颓势,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愈益显现,但中国社会依旧表现出了强劲的向前发展的趋势。这一切都使我们能够相信,这场大变迁最终能够完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朝向现代化的大转型,使得我们的国家和国民都能够实现近百年来崛起和复兴的伟大梦想。

二、边际性与两极化:中国体验的显著特征

既然我们谈论的是这样迅即和巨大的转型,以及在转型背景下中国人的精神嬗变,那么能够想象的是,同宏观的中国社会结构带有鲜明的二元特征一样,在现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即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中,也一定会带有鲜明的边际性。这种边际性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中国体验”是急速的社会变迁的精神感悟,是前后相继的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及其“翻转”带给人们的精神烙印,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变迁的一种独特视角,为我们构建中国品质的社会科学提供了现实的契机。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边际性人格的人被称之为“边际人”(Marginal Man)。边际人的概念内涵源自同样生活在转型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他不仅在《陌生人》中论述了与边际人十分类似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而且其本人实际上就长期扮演着一种“异乡人”或“陌生人”的边际角色。^⑩紧接着齐美尔,1928年,在稍后经历大转型的美国,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沿着相同的思路,将边际人形象地比喻为文化上的混血儿,他们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之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协调的。用帕克自己的话说,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不过,这种边际性,不仅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因为“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边际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⑪

我们曾经将“边际人”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历时态边际人,又称“过渡人”;其二,共时态边际人,又称

“边缘人”。其实,无论是过渡人还是边缘人都是边际人,其间的区别只是在前者是文化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后者是文化交融的产物。^④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与外部世界的全球化是一种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因与外部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融而发生或加快了变化;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因变化和转型更增添了对外部尤其是西方文化吸收的紧迫性和包容性,也使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因此,在整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又常常以比以往的社会快百倍千倍的速度发展的现代社会,边际人确实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转型人格,甚至可以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社会成员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孕育着边际人格的萌芽;而在这一背景或潮流中,唯因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迁或转型尤为剧烈,中国人人格和社会心理或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的边际性自然就更为鲜明。

如果说“边际人”真的能够准确地刻画出现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群像,那么如上所说,作为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其人格的二元特征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的本质特征。如果我们能够对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作一番认真的关照,那么确实可以说,这30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从多方面体现了这种“二元特征”。显然,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这种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及其社会成因,我们就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的本质,也能够找出这种精神嬗变对于13亿中国人民甚至其他处在变迁激流中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中国体验的二元性或极化特征的表征领域是多重的,从最基本的方面说,可以表现为:(1)传统与现代的颀颀:因为将几个世纪压缩在一起,不同时代的器物乃至精神气质难免会发生相互间的冲突和对立,这既为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也会导致人们的无所适从或朝秦暮楚;(2)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因为转型时代的社会变动尤其是迅疾的变动带来了人们期望值的提高,必然导致人们的满足感的降低,也就是说对现实的不满感极易滋生,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说,“不满”就是转型时代基本的精神特质之一;(3)城市与乡村的对峙,或者说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的对峙:前者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而后者则表现为敦厚、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虽然这两种人格特征说不上优劣对错,但显然相比之下都市人格更适应现代社会生活;(4)东方与西方的冲突:西方文化崇尚个人的自主和独立,他们在社会互动中也具有平等和民主的行为模式;而东方文化强调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强调服从权威,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国家权威,概莫能外;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遭遇西方文明的洗礼时,能够想象的到会遇到怎样的矛盾和冲突;(5)积极与消极的共存:一方面,精神嬗变过程中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本身就是变迁或转型的一种特征;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心理特征或精神特质也都可能在引发积极后果的同时,带来消极后果;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变迁带来的积极后果,而忽视它的消极后果,比如,对物质生活和经济成就的肯定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GDP的狂飙突进,但同样一种价值观也会带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除了上述5个方面以外,显然还可以用其他对立或极化特征来表征中国体验的二元性。比如,方文就尖锐地指出,中国体验不仅有愉悦的向度,也有忧伤的向度。^⑤他看到了,既然“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充满了不平等,不同社会群体的精神感受当然也就不会一样。

上述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或极化特征,并不单单表现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转型之中,事实上它也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种转型社会之中。早在1960年代,政治学家F. W. 雷格斯(F. W. Riggs)从泰国和菲律宾的社会转型研究中就发现,不仅在一般的社会状态上,即使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这种新与旧的作

风的混合,现代与传统观念的重叠,或许正是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质”。^⑧但中国社会转型的独一无二性,它的转型速度、涉及的人口规模、原有的历史传统、现有体制的刚性特点,甚至包括国家及政府权力的不受制约,等等,都决定了中国人民在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的二元性更为突出,或者说它的两极化特征更为鲜明。精神世界的二元性,或者说极化特征,既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提供了契机,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心理问题,其中包括:就整个社会而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人们失去了原有的传统和生活目标,但又不知道新的目标和规范在哪里——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现在对比任何文化典籍中描写的中国人(比如林语堂描写的“知足常乐”的中国人),都会反躬自问“我们还是中国人吗”;而就每个人或每个社会组织而言,如金耀基所说,“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⑨记得费孝通生前曾以传统中国社会为蓝本,设想在今日中国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安其所,遂其生”的美好社会,但现在看来,只要我们的社会未能从转型中相对固定下来,我们的“中国体验”不能去除这二元性或极化特征——换句话说,中国人不能从精神上解决“漂”的问题——这一理想的实现就依然待以时日。如此看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有赖于这种二元性或极化特征,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成熟也同样有赖于这种二元性或极化特征的消失。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描述与记录中国体验的二元性及其消逝,当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家的必修课程。

三、中国体验的关注价值与研究意义

我们知道,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基本上源自西方,它们事实上不过是18-19世纪欧洲社会转型或吉登斯所谓“现代性”的产儿。^⑩我们通过这一表述起码想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其普遍意义的;^⑪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或其他民族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世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而没有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

如果我们回顾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起码有这样两项研究因其揭示了人们精神世界嬗变的特殊意义而被视为研究典范,并且也因此解释人类行为尤其是社会行为时多少具备了普世意义。

第一项研究是1904-1905年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显然,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一种在基督教新教改革之后在欧美世界普遍出现的社会心态,它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或者说为欧美社会的转型铺平了道路。

在资本主义精神出现之前,支配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的是所谓传统主义。在传统主义那里,劳动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它使得人们只要能够满足习惯性的需要,就不会努力改变现存的生活方式。但是,宗教改革引发了传统主义的坍塌,除了造成了人们宗教信仰的改变以外,还促使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发生了朝向现代的改变,这包括:(1)职业观念的改变,即从原先的天意观转变为天职(Calling)观,用韦伯的话来说,“上帝所能接受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其在尘世所处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⑫如此,世俗行为就有了宗教意义,拼命挣钱也有了某种神圣性。(2)金钱观念的改变,如果说挣钱等世俗生活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天职,那么对钱的态度也从另一个方

面限制着资本主义精神:那就是勤奋挣钱的个人同时又必须具备禁欲的能力,克勤克俭,将节省下来的金钱作为新的资本进行投资,只有意识到钱是可以生钱的,也就是意识到金钱的孳生性,才真正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金钱观念。(3)时间观念的改变,既然我们的世俗生活能够增添上帝的光耀,那么每一刻都没有懈怠的理由,如此,韦伯不仅高度推崇富兰克林的道德箴言——“切记,时间就是金钱”,而且坚信“虚掷时光便成了万恶之首,而且在原则上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②显然,这种时间观不仅促进了时间度量的精确化(包括机械钟表的发明),而且后来也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纬度。

正是上述转变,带来了人们社会行为模式的转变,用韦伯的话来说,它导致了工具理性或形式理性行为的出现。此时,人们的举手投足不再仅仅凭传统和情感行事,甚至也不主要考虑行为的意义和价值,重视效率和可预测性的工具理性行为开始成为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模式。

第二项研究是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和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出版的《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这项研究最初始于1962-1964年,研究对象是阿根廷、智利、印度、以色列、尼日利亚和孟加拉6个国家的6000名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在城镇从事比较传统职业的人。两位社会学家想通过这项大规模的经验研究说明,人并不是生来就具有现代性的,促成人们向现代成功转向的是他们的特殊经历。

既然是社会环境的产物,那么具备现代性的人自然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英格尔斯和史密斯在六个发展中国家中首先确定有这样一些日渐鲜明的因素是典型的可以称之为现代的:工厂制度、大众传播媒介、城市生活和现代教育。尽管实际的研究过程十分复杂,但基本的结论一目了然:“我们首先强调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我们也认为,城市生活以及同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触会产生可以同工厂相提并论的影响。在强调这种经历形式更代表现代世界的特征的同时,我们没有忽视教育,更早的研究表明教育是个人现代性的一个有力的预报器”。^③

虽然有关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二元研究充满争议^④,英格尔斯和史密斯的“现代人”研究一样也可能带有其他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这项研究起码揭示了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那就是社会环境的改变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后者同样具备鲜明的社会意义:“它们不是派生于制度现代化过程的边际收益,而使这些制度得以长期运转的先决条件”。^⑤

尽管我们不愿意过度地渲染这两项研究的普世意义,但显然它们都因为揭示了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或国家所发生的特殊历史进程对其人民的精神塑造,而成为人们观察社会变迁会对人类社会心理的改变发生怎样影响的范例。而这两项研究所获得的上述一般结论,也被人们视为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人类行为律则。

回到中国体验上来。认真检视中国社会这30年来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显然,其独特性是无可怀疑的。诚然,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俄国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现在也无一例外都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的同时,也在经历时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而在这种奇特的变迁背景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或者说他们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震荡和嬗变,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自然也

会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但是,和中国经验一样,中国体验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及其精神世界只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他者”,中国体验一样具有普遍性的一面,或者说具有某种普世价值。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表述这种普适意义或普世价值:其一,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精神世界的嬗变,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其二,鉴于在人类及人类文化中存在某些普遍性的因素,就像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在西方形成的理论图式解释中国或东方的经验现象一样,在中国或东方形成的理论图式,也完全具有解释西方或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经验现象的可能。事实上,东方和西方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的不同,以往在西方形成的理论图式和未来在东方形成的理论图式的差异,可能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触摸到的人类不同的发展侧面而已。

中国体验的独特性和普世性,决定了将中国体验置于社会心理学或整个社会科学关注视域中的价值与意义。就中国体验自身的意义而言,一如成伯清所言,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并由此彰显中国人的意义世界的世界意义;关注中国体验,实际上也是要在以宏大叙事来描述、理解和统摄一切的做法之外,走进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以真正贴近社会运作的实际;关注中国体验,实际上是要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也就是创造自身生活的历程,展示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和丰富的历程;关注中国体验,还有一层关怀,就是从精英式的指点江山转向普通民众的现实世界,从宏大的社会结构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从表面的光鲜转向社会生活故事的全部。^⑤而就整个中国社会科学而言,关注中国研究则起码可以有这样几方面的意义:(1)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与进步,不仅影响到现有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也孕育了从中进行学术转换或提升的潜在可能性,已经有人意识到“中国这么巨大的变化不能转变为学术,这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⑥(2)中国的崛起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与中国经验^⑦相伴行的中国体验,因其发展和意义的独特性,使人们尤其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意识到能够成为他们从事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提升的经验来源,而“对这些东方模式的认知,不仅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线索去建构或再建构理论”,^⑧并因此可能改变原先中国社会科学家的“边缘的社会科学家”地位。^⑨

不难想象的是,如果我们能够以中国体验为核心议题,以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为研究背景,就有可能揭示中国人社会心理或精神嬗变的特殊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将其间的普世性的一面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理论相衔接”^⑩,并最终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健康发展。

注释:

- ① 方文:《转型心理学:以群体资格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4)。
- ② 周晓虹:《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野》,载《天津社会科学》,2011(6)。
- ③ 王小章:《关注“中国体验”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载《学习与探索》,2012(3)。
- ④ Allport, F. 1924, *Social Psychology*, Bos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 ⑤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441页。
- ⑥ [前苏]J. M.安德烈耶娃:《社会心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30页。
- ⑦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49页。
- ⑧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26页。

- ⑨ Inkeles, Alex. *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16.
- ⑩⑮ 方文:《部分公民权:中国体验的忧伤维度》,载《探索与争鸣》,2012(2)。
- ⑪ 马广海:《贫富差距悬殊也是一种中国体验》,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5)。
- ⑫ Simmel, Georg. "Stranger", In Georg Simmel,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0, 402.
- ⑬ Park, Robert E.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33.
- ⑭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535页。
- ⑯ Riggs, F. W. *Administ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4, 12.
- ⑰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77页。
- ⑱ Giddens, Anthony. *Sociology*, New York: Norton, 1988, 1.; 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载《社会学研究》,2010(2)。
- ⑲ 周晓虹:《社会建设: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载《学术月刊》,2012(9)。
- ⑳㉑ Weber, M.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40, 104.
- ㉒㉓ [美]英格尔斯、史密斯:《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7、455页。
- ㉔ 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载《社会学研究》,2010(2)。
- ㉕ 成伯清:《“中国体验”的意义和价值》,载《学习与探索》,2012(3)。
- ㉖ 黄万盛、刘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价值》,载《开放时代》,2009(7)。
- ㉗ 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㉘ 林南:《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载《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㉙ [美]傅高义:《当代中国研究在北美:超级强权下的边缘人语》,载《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㉚ 石之渝:《中国研究文献中的知识伦理问题:拼凑、累读与开展》,载《多元视野下的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On Chinese Feeling: Connotations, Characters and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Zhou Xiaohong

Abstract: During the time span of over three decades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drastic social transition, the values and social ment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undergone no less rapid changes, which are here termed as “Chinese feeling”. On the macro level,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is endowed with noticeable duality. on the micro level, the changes in values and social mentality, or in “Chinese feeling”, have also been characterized by their apparent marginality. This marginality, on the one hand, demonstrates that “Chinese feeling” is the mental crystallization of social transition and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two successive but heterogeneous eras as well as the turn from the former era to the latter. on the other hand, it constitutes a unique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n opportunity to construct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feeling, as an object of resear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us to utilize this unprecedented transition in China as academic resources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ultimately, it can help us to uncover the general rules concerning the changes of human social psychology.

Key words: Chinese Feeling; Connotations; Essential Characters;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